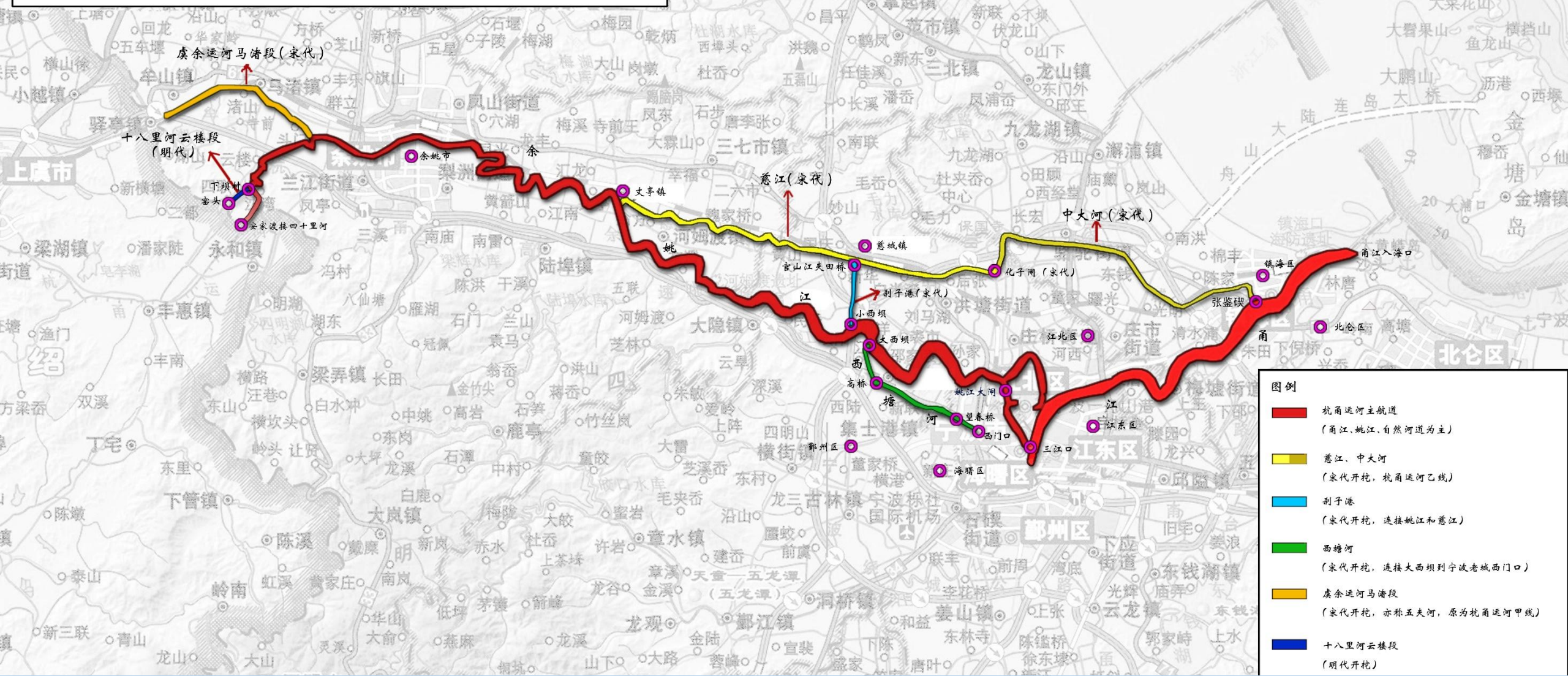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元素

概况

宁波(古明州)，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兼得江河湖海之利。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为宁波走向海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使宁波获得了广阔的内陆腹地。“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反映了宁波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独特地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港城宁波的持续辉煌。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推动着宁波从古代港口向现代化国际大港的成功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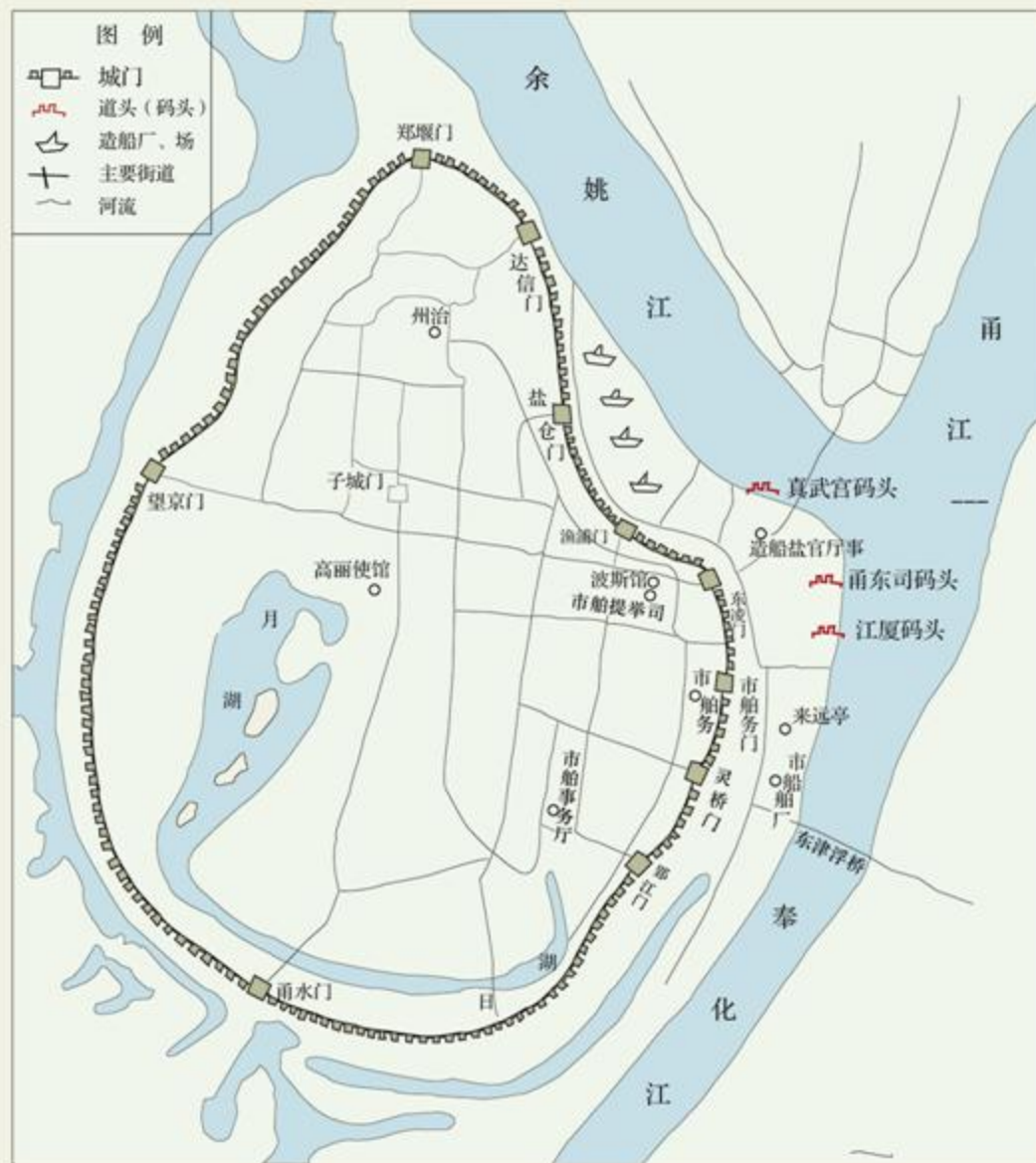
杭甬(浙东)运河(宁波段)航道线路示意图



始建于晋代的浙东运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京杭大运河融合，把传统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向东延伸了239公里，为千年古运河提供了一条便捷的出海通道。

宋明州（庆元）码头分布图

Map of docks of Mingzhou (qingyuan) in Song Dynasty



东门口码头遗址考古发掘

1979年，宁波市文管会办公室三次发掘了东门口宋代码头遗址，揭露面积1500余平方米。揭示出部分码头遗迹，出土的一批贸易陶瓷反映了当时商船出入的频繁。





长沙窑褐彩鱼藻纹执壶 唐

高19.4厘米，口径7.7厘米，底径10.00厘米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长沙窑褐彩狮子 唐
底6.3×3.2厘米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婺州窑青瓷碗 宋
底径5厘米
东门口码头遗址出土



龙泉窑青瓷贯耳瓶 元
底7×6厘米，高19厘米
东门口码头遗址出土



影青花瓷瓶元

底径4.3厘米，高10.5厘米

东门口码头遗址出土



元永丰库遗址全景

元至元十三年（1276），为「收纳各名项断没脏罚钞及诸色课程」，庆元路在子城东南隅兴建了永丰库。遗址为中国首次发现的元代地方大型仓库，出土文物反映了庆元港商贸的繁盛



“苦思丁”铭残碑元
高17厘米，宽22.8厘米
永丰库遗址出土



龙泉窑炉 元

直径9.5厘米，高8.3厘米

永丰库遗址出土



景德镇影青盘 元

底径6.5厘米，口径13.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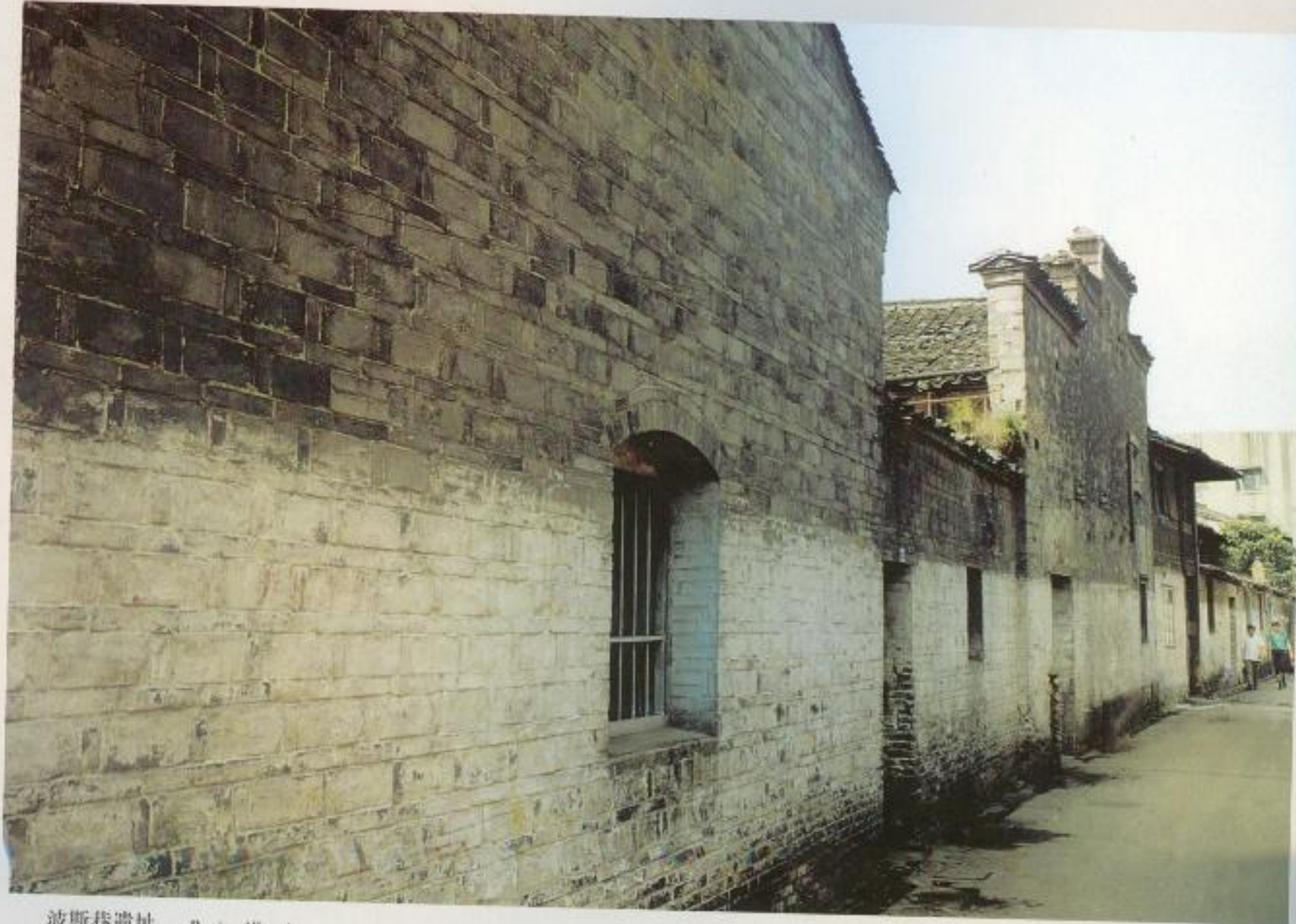
永丰库遗址出土



钧窑碗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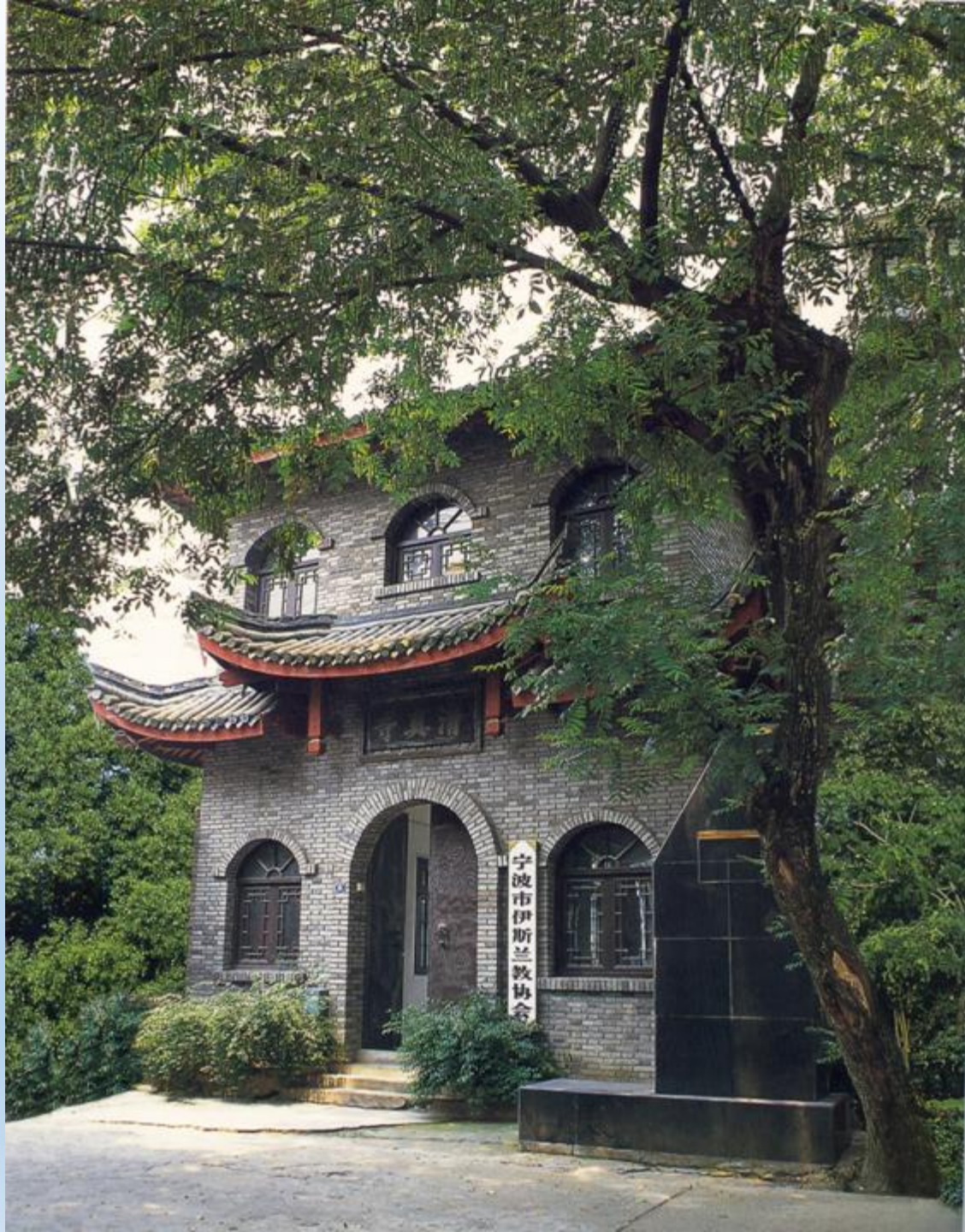
底径8.5厘米，口径20厘米

永丰库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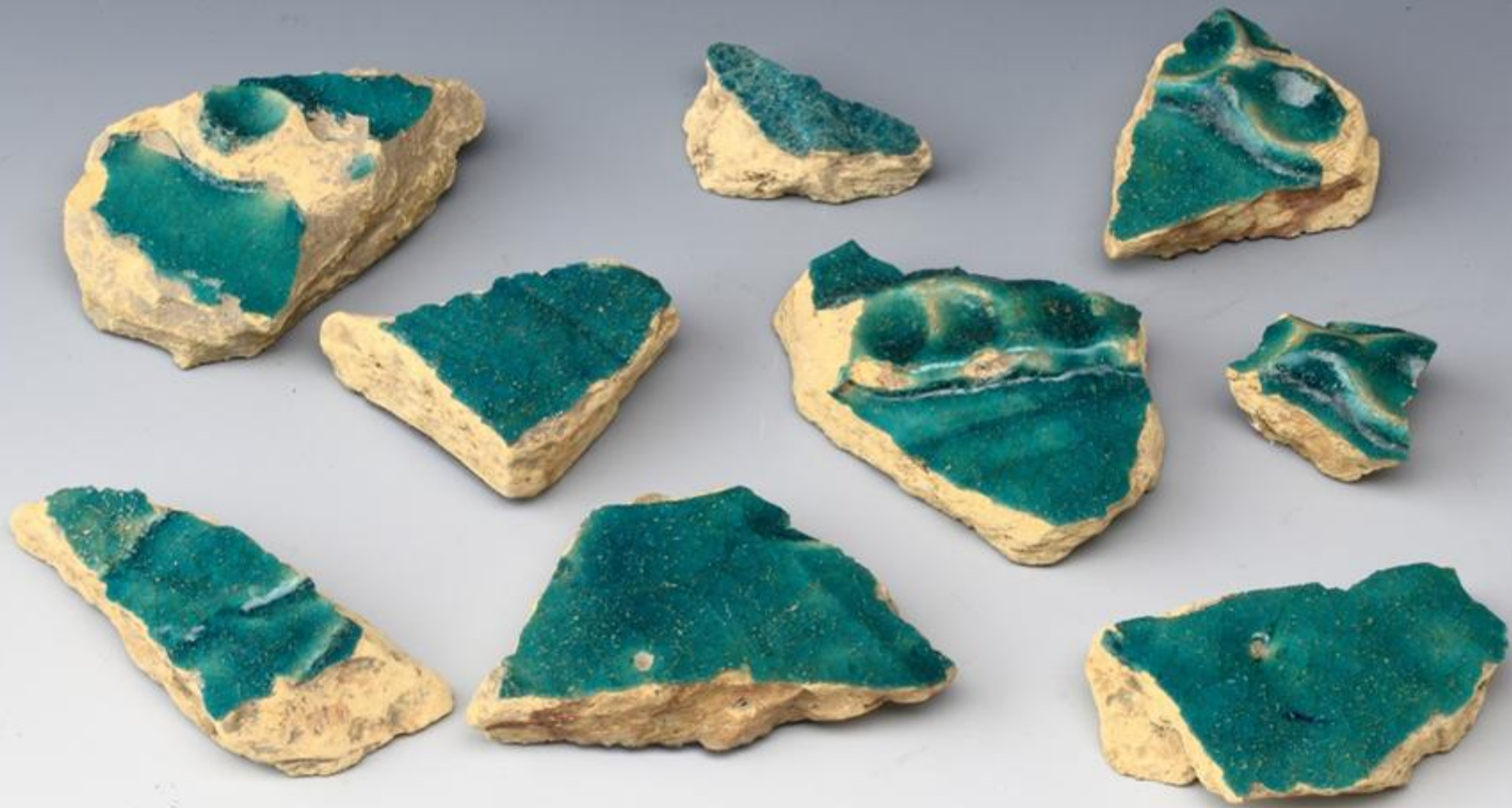


波斯巷遗址 Persian Alley site

波斯巷、清真寺
两宋时期，阿拉伯商人来明州渐多，他们长期聚居
的街巷称波斯巷，附近建有清真寺



波斯巷、清真寺
两宋时期，阿拉伯商人来明州渐多，他们长期聚居的街巷称波斯巷，附近建有清真寺



波斯陶器标本 唐 唐子城遗址出土



玻璃瓶（出土时内装香料）

南宋 天封塔地宫出土



越窑坐狮 唐

高17.0厘米，底径长12.3厘米，底径宽8.8厘米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旅日华侨捐资修路的石碑之一 南宋
侨居日本大宰府的明州籍侨民丁渊、张宁等商人捐资修路的石碑



宋市舶城門段考古發掘現場



明「宁波市舶提举司」遗址

洪武三年（1370），明朝在宁波设立「宁波市舶提举司」，限定宁波港只准接纳日本勘合贸易的「贡船」



高丽使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宋政和七年（1115），朝廷在明州建高丽使馆（高丽行使馆），置高丽司，以接待往来明州的高丽使者、商贾。



日本大宰府鴻臚館遺址
古代日本接待外交使節及商人的設施。
明州商團在此登岸、
居住和交易。

明宣宗手諭

宣德七年（1432），日本天皇派京都天龙寺主持龙室道渊（原籍宁波）为正使率使团入明，明宣宗赐手諭。

皇帝勅諭日本國使道淵
尔究通佛氏之旨曉
達君臣之義在彼境
內超於羣倫比者以
其國王之命遠涉海
波來脩朝貢達其王
敬
天之懃敷其王事大之心
言詞有章進止有禮
從容恭謹朕甚嘉之
今特授僧錄司右覺
義之職俾歸本國住
持天龍寺尔其益精
善道以闡宗風益堅
至誠用副嘉獎欽哉
故諭



宣德八年六月初六日

明宣宗手諭（复制）
Ming Emperor Xuanzong's edicts to the Japanese envoys
宣德七年六月六日
1432年6月6日

海上交通

古代船舶

“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遗址的水下考古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随着端午期间央视多个频道对这一考古的直播，这一沉船的考古发掘不仅引起很多宁波人的关注，也将吸引全国观众的目光。事实上，此前宁波范围内已经发现了 4 艘古代沉船，从和义路唐代龙舟、海运码头北宋沉船、和义路南宋沉船、象山涂茨明代沉船，到现在的“象山小白礁 I 号”清代沉船，这 5 艘沉船遗址排成了一个时间段相对连贯的古船系列，见证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辉煌。



象山涂茨明代海船



象山小白礁 I 号

近代船舶

宁波港的前身是宁波港务局。宁波港由北仑港区、镇海港区、宁波港区、大榭港区、穿山港区组成，是一个集内河港、河口港和海港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深水大港。现有生产性泊位309座，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60座。最大的有25万吨级原油码头，20万吨级（9可兼靠30万吨船）的卸矿码头，第六代国际集装箱专用泊位以及5万吨级液体化工专用泊位；已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通航。2012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开放宁波港梅山港区。2013年，宁波舟山组合港全年货物吞吐量达到8.09亿吨，超越上海港，位居世界第一。2014年度宁波舟山港实现货物总吞吐量8.73亿吨，牢牢占据货物总吞吐量世界第一大港的宝座。



宝顺轮

明州68



勤丰128

27 3 2008





宋船复原模型
东门口码头遗址出土



象山唐船

象山县石浦杨氏古船坊

ysguchuan.cn.alibaba.com



南宋驳船 和义路滨江遗址出土
A Southern Song Barge
From the Site of Heyi Road Riverside

2003年12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和义路滨江遗址发掘，出土一艘南宋驳船。

南宋驳船 和义路滨江遗址出土
主要用于小宗货物从河岸到海港大船之间的驳运，是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联通的历史证物。



韩国新安木浦元代沉船

1976年发现于韩国新安（木浦）海底，是一艘泉州制造的日本东福寺造营料唐船，由庆元港开出前往日本，绕道行至高丽新安道德岛时沉没。沉船以及出水的大量遗物，再次证实元代庆元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海上贸易

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始于东汉，盛于唐宋，历经一千余年。早在东汉时期，明州（宁波）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到唐代，上林湖越窑已成为中国青瓷六大名窑之冠。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越窑青瓷千百年来，以它的圣洁，吉祥，典雅，庄重和似冰类玉的釉色，为唐、五代、宋、三代朝廷贡品，身价与珍宝、丝绸一样高贵。而秘色瓷则是越窑青瓷中最佳代表作，它工艺精湛，胎质细腻，釉色晶莹青绿，似翡翠碧玉，温润典雅，为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供奉品，并由古明州港启运远销东南亚及非洲大陆等地，航线成为著名海上“陶瓷之路”，对沟通中国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龙泉青瓷、韩国青瓷、日本青瓷、台湾青瓷等都是在越窑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越窑青瓷为我国陶瓷史上最具有特色，最有影响，经历的历史时间最长的瓷种，在世界文明史上留有光辉灿烂的篇章。



对宁波来说，这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回归。作为越窑青瓷的发祥地和中心产地，1000多年前，慈溪上林湖越窑生产的青瓷源源不断地输往大江南北，开辟了从明州通向海外的著名的“陶瓷之路”。

烧制了千年，消逝了千年，在千年的辉煌与千年的落寞之后，越窑青瓷再次回归，重放光彩。

在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源于三种独具东方色彩的物品：丝绸、茶叶和瓷器。从某种意义上说，瓷器的影响甚至要超出丝绸和茶叶，这一点从西方人对“C h i n a（中国）”的称谓可以看出。不管学界对c h i n a一词的起源如何众说纷纭，但肯定的一点是，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陶瓷以及“陶瓷之路”对西方生活的深刻影响，使得“瓷器”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瓷器的影响甚至足以与中国的四大发明相提并论。学界有人主张将陶瓷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并列一起，称为中国的五大发明。瓷器作为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实证，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与财富；而作为瓷器的发祥地，宁波书写了中华文明璀璨的一页，演绎着陶瓷文化独特而丰厚的记忆与传奇。

在唐代，开辟了从明州通向海外的“陶瓷之路”，北达高丽（朝鲜），东至日本，南经广州，通向两条路线，一是向东南，通向菲律宾、马来西亚诸国；另一是向西南，沿海岸至越南达泰国、缅甸，经孟加拉湾，到印度、巴基斯坦，直抵波斯湾和地中海沿岸伊朗、埃及等。

“陶瓷之路”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开启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

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陶瓷之道》。

“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

大量越窑青瓷通过“陶瓷之路”行销海外，至今在海外考古发掘和博物馆收藏中，有难以计数的越窑青瓷遗存。

日本：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

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公元9世纪初，越窑青瓷依托明州港口，经海路大量运输至亚、非各国，成为中国最早输往海外的大宗商品，这条主要运送越窑陶瓷的海上航道，被誉为“海上陶瓷之路”。1973年至1975年间，在宁波和义路滨姚江南岸码头遗址，出土了700多件越窑青瓷，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唐越窑青瓷中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质量较精的一批。

在海外也发现了大量的越窑贸易青瓷，在亚非各国中世纪的都城、枢纽港口，贸易集散地遗址，佛教、伊斯兰教的寺院和祭祀遗址，宫殿建筑以及贵族墓葬等遗址，都发现了出自慈溪上林湖与鄞州东钱湖窑场生产的越窑青瓷，他们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物证。在日本大宰府就有出土的唐五代越窑青瓷，朝鲜半岛也有出土的唐越窑青瓷，在印度尼西亚海域也有唐代越窑青瓷打捞出水。1998年，在印尼爪哇附近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打捞出5万多件瓷器，其中有200余件唐越窑青瓷伴随出水。在印尼井里汶外海发现的一艘北宋早期贸易的沉船内，2003年至2005年，考古人员从沉船打捞出水遗物的总数达到49万余件，瓷器30万余件，其中大部分是越窑青瓷，这是迄今海外发现越窑青瓷数量最多的一次。

浙东烧制的瓷器历史可追溯到商周时期，“越窑”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是对这一地区青瓷制品的统称。早在东汉时，上林湖就已成功烧制出大型的罐、坛等日用青瓷器皿。瓷器纹饰简古，造型淳朴，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越窑青瓷到唐、五代时达到盛期，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越窑为中国陶瓷树立了一座丰碑。从遗址的情况看，上林湖越窑遗址堆积丰富，规模宏大，时间跨度大，因而被称为“露天青瓷博物馆”。

上林湖之所以出现众多的越窑遗址，因为这里蕴藏着大量的优质瓷土资源，而且这里山峦起伏、森林密布，有丰富的烧瓷燃料；在地理位置上，上林湖地处杭州湾南岸，临近唐代国际贸易港——明州港，水陆交通相当便利。大量制作精致、造型优美的青瓷精品从上林湖越窑被烧制出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海内外各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随着越窑青瓷的海上丝绸之路拓展，越窑的制瓷技术也得到传播。公元10世纪前半叶，越窑的制瓷技术传到了朝鲜半岛全罗道康津与全罗北道扶安等地，朝鲜半岛因此烧制出了“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的“翡色”瓷器，并且迅速发展成为青瓷的输出国，目前朝鲜半岛仍存有丰富的属于浙东越窑类型的遗址遗存，日本也有仿制越窑青瓷的瓷器出现，越窑青瓷也促进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



西晋越窑青瓷堆塑罐



北宋青瓷镂空缠枝纹熏炉



唐秘色荷花荷叶盏与托具



越窑荷叶盏托
Celadon lotus-leaf shaped saucer, Yue Ware.

唐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Tang dynasty From the site of Heyi Road Wharf



越窑风字形砚
Celadon ink slab in a trapezoidal shape like the Chinese character "风", Yue Ware

五代 余姚市大隐早溪头出土
Five Dynasties From Hanxitou, Dayin, Yuyao city



越窑瓜棱执壶
Celadon melon-shaped pitcher, Yue Ware
唐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Tang dynasty From the site of Heyi Road Wharf



越窑对凤纹粉盒
Celadon powder box with a pair of phoenix
design, Yue Ware
北宋 余姚市彭乡出土
Northern Song dynasty From Pengxiang, Yuyao city



越窑荷叶纹海棠杯
Celadon floriated cup with lotus leaf design,
Yue Ware
唐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Tang dynasty From the site of Heyi Road Wharf



越窑油盒
Celadon oil box, Yue Ware
唐 江北区慈城出土
Tang dynasty From Cicheng, Jiangbei district



日本大宰府出土的唐五代越窑青瓷



“黑石号”沉船出土的唐越窑青瓷



“黑石号”沉船出土的唐越窑青瓷



“黑石号”沉船出土的唐越窑青瓷



印度尼西亚井里汶沉船出土的唐越窑青瓷



菲律宾出土的唐宋越窑青瓷



泰国南部林民波遗址出土的唐越窑青瓷



埃及福斯塔特（今埃及开罗南部）遗址出土的
唐宋越窑青瓷



越窑荷叶盖托 唐

通高6.6厘米，口径11.8厘米，足径6.6厘米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越窑瓜棱执壶 唐

高22.1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8.2厘米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越窑盞柄药壶

口径5.5厘米，底径5.2厘米，高8.4厘米。
唐 1975年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越窑绞胎灵芝纹伏兽脉枕 唐

高9.3厘米，底径长11.0厘米，底径宽7.5厘米
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青瓷虎子 东晋 韩国江原道出土



越窑鸚鵡纹粉盒 五代
通盖高4.6厘米，口径11.6厘米，底径5.8厘米
余姚出土



仿越窑鹦鹉纹盒

Box with Parrot Design in the Style of Yue Ware

吴越铜镜



五代吴越地宫出土铜镜



镶嵌绿松石透雕几何纹镜

战国 直径10.6厘米 日本千石唯司藏

圆形，夹层，环钮，四叶纹钮座。主题纹饰由一方框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四叶尖处各伸出一W形，方框内四角饰桃形花纹。方框外饰几何纹、叶纹。镜缘饰叶纹一周。主题纹饰上有纤细的云纹。钮座、方框及纹饰均镶嵌绿松石。

古钱币



名闻天下的宁波钱币文化

宁波钱庄业曾是重要的文化景致

宁波钱庄业，在历史上，曾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它不仅是宁波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宁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钱庄业的兴起，与宁波的地理位置和贸易繁荣密切相关。钱庄业的衰落，则与近代金融体系的变革有关。钱庄业的兴衰，见证了宁波历史的变迁。

钱庄业的兴起，始于唐宋时期。当时，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商人之间需要一种便捷的支付方式。钱庄应运而生，它们通过发行“钱票”来代替铜钱，极大地方便了交易。钱庄业的鼎盛时期是在明清两朝，那时宁波的钱庄遍布全国，甚至远至海外。

钱庄业的衰落，始于清末民初。随着西方银行制度的传入，钱庄业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加之战乱频仍，钱庄业陷入了困境。到了民国时期，钱庄业已经名存实亡。钱庄业的衰落，是宁波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



宁波市钱庄博物馆



宁波市钱庄博物馆藏“大元通宝”铜钱

钱庄业的兴衰，是宁波历史的一个缩影。它见证了宁波经济的繁荣与衰落，也见证了宁波文化的变迁。钱庄业的兴衰，是宁波历史的一个缩影。它见证了宁波经济的繁荣与衰落，也见证了宁波文化的变迁。

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极富地域特色

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些货币的发行，是革命根据地经济自主的体现。它们不仅方便了根据地内的交易，也体现了根据地政府的治理能力。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是革命根据地经济繁荣的一个标志。

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根据地政府为了支持抗战，发行了大量的革命根据地货币。这些货币的发行，极大地支持了抗战的顺利进行。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是革命根据地经济自主的一个体现。

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些货币的发行，是革命根据地经济自主的体现。它们不仅方便了根据地内的交易，也体现了根据地政府的治理能力。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是革命根据地经济繁荣的一个标志。

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些货币的发行，是革命根据地经济自主的体现。它们不仅方便了根据地内的交易，也体现了根据地政府的治理能力。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是革命根据地经济繁荣的一个标志。

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些货币的发行，是革命根据地经济自主的体现。它们不仅方便了根据地内的交易，也体现了根据地政府的治理能力。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行，是革命根据地经济繁荣的一个标志。



宁波市钱庄博物馆藏“大元通宝”铜钱

宁波是“海上钱币之路”始发港之一

宁波是“海上钱币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历史上，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钱庄业的兴起，与宁波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钱庄业的衰落，也与宁波的地理位置有关。宁波的钱庄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宁波是“海上钱币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历史上，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钱庄业的兴起，与宁波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钱庄业的衰落，也与宁波的地理位置有关。宁波的钱庄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宁波是“海上钱币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历史上，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钱庄业的兴起，与宁波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钱庄业的衰落，也与宁波的地理位置有关。宁波的钱庄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宁波是“海上钱币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历史上，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钱庄业的兴起，与宁波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钱庄业的衰落，也与宁波的地理位置有关。宁波的钱庄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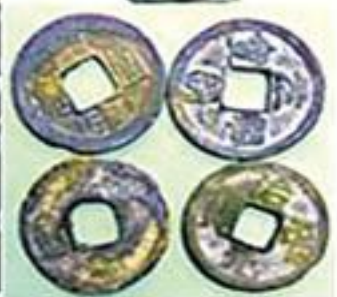
宁波是“海上钱币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历史上，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钱庄业的兴起，与宁波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钱庄业的衰落，也与宁波的地理位置有关。宁波的钱庄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宁波是“海上钱币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历史上，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钱庄业的兴起，与宁波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钱庄业的衰落，也与宁波的地理位置有关。宁波的钱庄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宁波是“海上钱币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历史上，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钱庄业的兴起，与宁波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钱庄业的衰落，也与宁波的地理位置有关。宁波的钱庄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宁波是“海上钱币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历史上，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钱庄业的兴起，与宁波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钱庄业的衰落，也与宁波的地理位置有关。宁波的钱庄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宁波是“海上钱币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历史上，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钱庄业的兴起，与宁波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钱庄业的衰落，也与宁波的地理位置有关。宁波的钱庄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海底沉船中的中国古陶瓷与古钱币

海底沉船中的中国古陶瓷与古钱币



宁波市钱庄博物馆藏“大元通宝”铜钱



西属墨西哥双柱双地球银币

2012年向林南中先生征集。月港的兴起，恰逢欧洲人东来。通过月港，漳州等地的居民不仅首次接触到西班牙银币，而且很快将它当作通行货币。

丝绸

丝绸(sī chóu)，一种纺织品，用蚕丝或合成纤维、人造纤维、长丝织成；用蚕丝或人造丝纯织或交织而成的织品的总称。

在古代，丝绸就是蚕丝(以桑蚕丝为主，也包括少量的柞蚕丝和木薯蚕丝)织造的纺织品。现代由于纺织品原料的扩展，凡是经线采用了人造或天然长丝纤维织造的纺织品，都可以称为广义的丝绸。而纯桑蚕丝所织造的丝绸，又特别称为“真丝绸”。

丝绸也特指桑蚕丝所织造的纺织品。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汉族劳动人民是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是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从汉代起，中国的丝绸不断大批地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产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路，曾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之为“丝国”！

从西方语言演变历史以及中西方文明交流史的角度进行考证，认为“CHINA”一词来源于丝绸。按照欧洲语言的演变历史，对丝绸与“CHINA”一词之间的关联作了解释。在希腊文明时期，中国的丝绸已经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了欧洲，于是希腊文中也出现了“丝”这一词汇，希腊文中“丝”的发音与中文相近。随后，在拉丁文中，“丝”的发音已经基本与以后“CHINA”的发音相近，在法文中，“丝”的拼写则为“CHINE”，与英文“CHINA”的发音与拼写已经非常接近，最后再从法文正式“过渡”到了现在的“CHINA”一词。英文在对“中日甲午战争”的翻译中，中国被译成“SINO”，这与拉丁文中的“丝”比较接近，而在印度语中，“丝”被称为“CINA”，后来口译成“支那”。丝绸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种载体，在西方人眼里，丝绸是中华古代灿烂文明的象征，因此，英文中“中国”的翻译“CHINA”源自丝绸就顺理成章了。

“爱好奢华的罗马帝国统治者看到丝绸，立即对这种柔软而又美丽舒适的衣料着迷了。他们以往穿的是粗糙的羊毛织物和亚麻布，根本不知道丝织品是什么东西做的，所以只好称它是‘来自天堂里的织物’。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运输艰难，波斯商人的中间盘剥甚重，中国的丝绸在罗马帝国市场上的价格令人膛目结舌，几乎与同等数量的黄金相等价。最初，只有少数罗马贵妇才敢于问津，穿在身上以显示其身份的高贵。据外国史书的记载，罗马执政官恺撒穿绸袍看戏，当时还被人们视为过分奢华。丝绸如此昂贵，日久天长，罗马人渐渐感到从波斯商人手中转买丝绸，实在太亏了，如果能直接从‘丝国’（指中国）进口丝织品，甚至能弄到这种神秘织物的原料，就可以省许多钱。

从此，罗马人便开始努力打探丝绸的来源。但是，历代中国皇帝不愿将这种制造“国宝”的技术传到国外去，为了获取蚕丝贸易的利益，中国历代政府都只准输出蚕丝和丝绸，而严禁蚕种出口。从汉武帝开始，历代皇帝都明令凡是偷运或将养蚕秘方泄露给外国人的都要处以死刑。这样，罗马帝国的历代统治者从屋大维开始，想要获取中国养蚕术的努力都落了空。养蚕缫丝技术，罗马人终不解其中的奥秘。因为，罗马人长期误认为丝绸是用一种长在树上的羊毛织成的，但是，这种特殊的羊毛罗马人始终寻觅不到。一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这种状况才有了转变。





钱山漾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丝线



外国人在欣赏以及身穿丝绸



宗教交流



天童寺

天童寺，号称「东南佛国」，历史上众多日本等地僧人在此学习佛法，在中外佛教文化交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千光荣西（1141—1215）

日本僧人，南宋年间在天童寺学禅五年，并将中国佛教临济宗传播到日本



道元禅师（1200—1253）

日本僧人，南宋年间入天童寺学习佛法，归国后创建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尊天童寺为祖庭。



兰溪道隆（1213—1278）

天童寺名僧，南宋年间东渡日本，是第一位到日本传授禅法的中国禅师。



无学祖元（1226—1286）

鄞县僧人，元至元十六年（1279）赴日弘扬禅宗，其开创的“佛光派”禅系一度是日本最有影响的禅派。



义天（1055—1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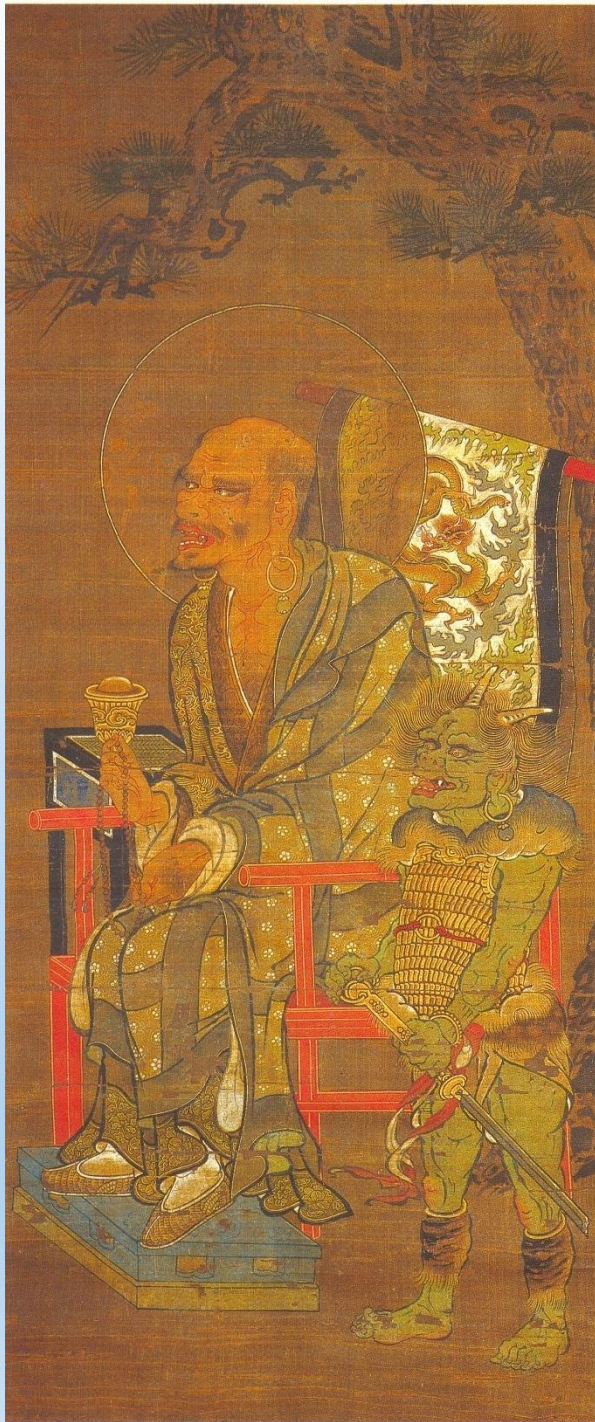
义天，高丽王朝文宗第四子，宋朝时期在明州学习佛教，
为高丽天台宗始祖



建筑：陈和卿主持重建的东大寺南大门

南宋年间，北宋的浙东佛教建筑被直接移植到日本，成为镰仓时代建筑风格的新形式，被称为“天竺样式”或“大佛样式”。

由南宋明州匠师陈和卿实际主持重建的南大门，为典型的中国南方建筑样式，被称为“大佛样”或“天竺样”。



绘画：《十六罗汉像》（复制）原件藏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
宋元明州（庆元）车轿街、石板巷一带，画坊林立，职业画家陆信忠、金大受、陆仲渊等佛画作品，被日本舶商和僧侣争相购买携往日本，成为日本寺院收藏品和临摹的范本。

建仁寺《荣西禅师茶思》碑文

从日僧最澄、空海的携茶叶、茶籽返日到南宋时期荣西专著《吃茶养生记》的传扬，日本茶道文化在宁波的影响中逐步发展形成。

荣西禅师茶德显彰碑铭

茶は養生の仙薬なり
延壽の妙術なり

これは建仁寺寄附山荣西禅师(二四一—二二五)の「喫茶養生記」の巻頭の句です。

禅师は備中国四山の生れ、仁安三年二十八歳の時と文治三年四十七歳の時と二度に亘つて宋代の中国へ艱難辛苦の末渡航され、天台山天童寺、阿育王寺で五年有余の修行され、孝宗皇帝から「千光」の号を下賜せられ、禅宗を我国へ初めて傳えられました。

帰国後、建仁二年(一二二二)に建仁寺を創建されました。また中国から茶の種子を持ち帰り、茶樹の栽培と喫茶の風初白の普及に尽力され、我国の茶祖と仰かれています。

建仁寺とお茶のつながりはよく知られていますが、更に一人でも多く禅師の徳にあやかるよう、開山堂前に茶碑を建立致しました。茲に禅師への報恩と山門の境致莊嚴を念願し、永く茶祖荣西禅师のご遺徳を讃仰せんと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昭和五十八年四月五日

建仁寺 管長

竹田益州 米壽謹誌



朱舜水（1600—1682） 江户时代立原杏绘 日本茨城

县立历史馆藏。

朱之瑜，号舜水，余姚人。1659年流寓日本，在长崎、江户等地讲学达22年，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尊为国师。他将中国的礼仪制度、建筑营造、农事园艺乃至服饰等介绍到日本，其学术思想对后来的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

日本小石川后乐园

受朱舜水影响，日本江戸时代兴起「中国风」，尤以小石川后乐园为代表。后乐园初建于日本宽永6年（1629），重修时朱舜水参与设计，园名据其提议而定。庭园仿中国式，其中圆月桥为朱舜水亲手设计。成为日本特别古迹与特别名胜。



阿育王寺/

阿育王寺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宝幢太白山麓华顶峰下，始建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已历经1700多年历史。

阿育王寺素有“东南佛国”之称，是佛教禅宗名寺，中国佛教“五山第五”。也是中国现存唯一以印度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寺。因寺内珍藏佛国珍宝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及玲珑精致的舍利宝塔而闻名中外，1984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

建筑格局

编辑

阿育王寺全景图

阿育王寺现占地面积124100平方米，建筑面积23400平方米。现存殿、堂、楼、阁600余间，依山坡构筑。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二山门、放生池、天王殿、大雄宝殿、舍利殿、法堂和藏经楼。右侧有云水堂、鄮峰草堂、拾翠楼、祖师殿、承恩堂、方丈殿、宸奎阁、寮房等361间；左侧有松光斋、钟楼、舍利单、先觉堂、大悲阁等264间。大雄宝殿系清康熙年间重建，殿上有乾隆书“觉行俱圆”匾。舍利殿始建于1678年，重檐，黄色琉璃瓦盖顶，石雕舍利塔一座，内置七宝嵌镶塔亭，塔身青色，五层四角，四面窗孔，每层雕菩萨神像，内顶悬宝磬，舍利珠挂在其中。寺内有浙江省仅存的两座元塔，砖木结构，仿楼阁式，六面七层，每层置腰檐、平座，底层四周有围廊



保国寺/

保国寺位于浙江宁波市江北区洪塘镇的灵山麓，距市区15公里，始建于东汉世祖时期，初名灵山寺，此即保国寺的前身。唐会昌五年寺宇被毁，广明元年（880年）重建，僖宗李儂赐“保国寺”匾额，此后改名为保国寺。

保国寺并不是以其宗教寺庙闻名于世，而是因为精湛绝伦的建筑工程工艺令人叹为观止。寺内的大雄宝殿（又称无梁殿），是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存有大雄宝殿、天王殿、唐代经幢、观音殿、净土池等殿宇古迹。

建筑特点

编辑

保国寺最初由山门、天王殿等建筑组成。大雄宝殿重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是长江以南最保国寺

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佛教建筑，其结构独特，气势恢宏。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加建重檐，成为歇山顶形成。大雄宝殿主要特点是：平面布置进深（13.38米）大于面阔（11.83米），呈纵长方形；在前槽天花板上绝妙的安置了三个缕空藻井；复杂的斗拱结构；四段合作瓜棱柱，柱身有明显的侧脚；梁伏、阑额做成两肩卷刹的月梁形式等。这些都接近或吻合于宋《营造法式》，承袭某些唐代建筑遗风，为研究宋代建筑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

其他多为清代建筑。1983年迁入明代厅堂三间，1984年迁入唐代经幢两座，现在保国寺已成为一个拥有唐、宋、明、清、民国等各个时期的木构建筑群体。占地面积13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排列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藏经楼五幢建筑，东西轴线分别为钟楼、鼓楼、客堂等附属建设。



七塔寺

七塔寺在宁波市[江东区](#)百丈路183号，是市区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寺院，也是浙东著名四大丛林之一。始建于858年（唐大中十二年），称东津禅院，曾改称"栖心寺"、"崇寿寺"、"楼心寺"。后因在[康熙年间](#)寺前建有七座石塔代表七尊佛而得名。"文革"期间，该寺遭到破坏。1979年后，逐渐修复寺前七塔、寺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方丈殿、[藏经楼](#)、钟楼、[玉佛](#)阁、慈荫堂、东西厢房及围墙等，建筑面积1.14万余平方米。

景观景点

编辑

[七塔禅寺](#)现为浙江省重

[七塔寺\(4张\)](#)

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除主要殿堂为古典建筑外，还保存有一批珍贵文物：①寺院开山祖师心镜藏奂禅师舍利塔，上刻“唐敕赐心镜禅师真身舍利塔”等字样。②宋代[大铜钟](#)两口，各重达七、八千斤，分别铸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和嘉定十一年（1218）。③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印、光绪颁赐之《龙藏》一部。④梵文[贝叶经](#)一束。⑤清代石刻[五百罗汉](#)造像图，工艺精妙，形神兼备，佛门珍品，海内无双。⑥“栖心一览”文物陈列室所藏各种珍贵文物等。^[1]

七塔寺的殿宇建筑，基本保持明、清时代建筑风格古色古香，庄严典雅。山门、天王殿、[圆通宝殿](#)、[三圣殿](#)、[藏经楼](#)（下为法堂）由南向北，先后贯穿在一条中轴线上。东侧厢房，由外及内，依次为钟楼、香烛（法物）供应处、五观堂、诸经坛、自动化办公室、报恩讲堂等，厢房北面为玉佛阁（慈荫堂），东面为库房、综合楼、招待所等。西侧厢房，依次为鼓楼、客堂、净土坛、电脑监控室、栖心一览（文物陈列室）等。



photo by jinyan

机构及建筑

庆安会馆

---2014年06月26日，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宁波从此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行列。位于三江口的庆安会馆作为运河的附属遗存，也名列世界文化遗产之中。

---“这里既是中国大运河的南端终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起航港。正是因为宁波三江口，才使得大运河不仅成为沟通中国南北方的水上通道，也成为连接世界的大通道。”

---浙东运河在宋代全线贯通后，货物用内河航船运抵宁波三江口，都需要在此换乘抗风浪性能较好的海船经甬江口出海。

同样，那些从闽广等地及日本、朝鲜半岛驶来的海船，都需要在宁波三江口停泊卸货，而后换乘内河船只，经浙东运河至内陆大城市。

而作为大运河管理设施的庆安会馆，是成为当时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汇传播的重要历史遗存。

建筑特色

它是浙东近代木结构建筑典范。平面布局呈纵长方形，座东朝西，中轴线上

庆安会馆

现存建筑有宫门、仪门、前戏台、正殿、后戏台、后殿、左右厢房、耳房及附属用房，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建筑上保存了1000多件朱金木雕，200多件砖雕、石雕艺术品。采用宁波传统的雕刻工艺，历百余年寒暑仍不失奇妙光彩，充分体现了清代浙东地区"三雕"工艺技术的至高水平。不仅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为研究我国雕刻艺术提供了实物例证。其中，朱金木雕，主要使用在建筑各类构件上，以民间故事，戏曲人物为主，大多采用高浮雕和镂空雕相结合的工艺技法。经过油漆、贴金、拔朱、上彩，显得富丽堂皇、高贵典雅。

庆安会馆建筑群座东向西，占地面积约3900平方米，原中轴线上有照壁、接水亭、宫门，前殿(连戏台)，大殿(连戏台)。后殿、左右厢房及偏房等。大殿为庆安会馆的主要建筑，面宽为五开间，明间为拾梁式，次间为穿斗式。该建筑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了宁波传统的朱金木雕，砖雕和石雕的建筑装饰手法，使整体建筑气势恢宏、金碧辉煌。匠心独用的砖雕、石雕和朱金木雕令人赞叹，堪称宁波地方工艺中的杰作。

砖雕是庆安会馆建筑主要的装饰手法之一，主要分布在门楼和高大的马头墙上，雕刻的笔法细腻。画面充分运用我国传统的立体布局，众多的人物层次分明地并列于画面上，栩栩如生。内容丰富，大多选自民间传说和戏曲中的传奇人物如八仙、三星、九老等，还有花鸟动物和博古。大殿原系祀天后的神殿，高约10多米，明间和次间各有一对蟠龙柱，柱上倒挂式苍龙威风凛凛，张牙舞爪，这是采用镂空雕刻的形式，在整块的石料上一气呵成，现形体于青石之外，寓玲珑于浑厚之中，与此相呼应的凤、凰两柱也是采用这种雕法。庆安会馆

庆安会馆

与龙、凤柱相近的两侧墙面上，分别嵌有一高、宽均为1.5米的浅浮雕石刻，把古杭州的山水、楼台，"西湖十景"和玉泉鱼跃，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眼前，使细腻的浅刻法与龙凤柱豪放浑厚的风格形式鲜明的对照，使人们情不自禁地领略到沉重舒长低细绵密，清油园润的韵味!戏台顶部的藻井俗鸡笼顶，其制作更是巧夺天工，它是用千百块精致的狭长盘花板接榫、拼搭而成，穹窿形的园顶玲珑奇妙、变化多致。梁、枋等构件上的朱金木雕，富丽堂皇，精美绝伦，充分显示着宁波工匠的聪明才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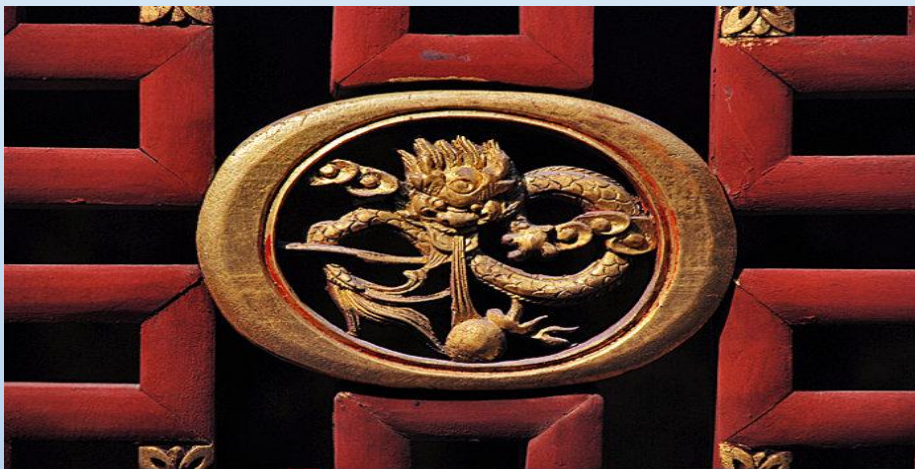
砖雕

砖雕是庆安会馆的重要艺术特色。砖雕作品主要分布于门楼、山墙。会馆正门“天后宫”三字两侧为“双龙戏珠”图样，模仿御牌。屋脊砖雕多采用人物和吉祥图案。戏台屋顶雕有卷龙，正脊雕有奎星和瑞兽图案。最为丰富的是墀头的砖雕。雕刻的重点为墀头下部，采用影雕表现人物戏曲故事。



石雕

石雕是庆安会馆建筑艺术的又一特色。石雕代表是一对蟠龙和一对凤凰牡丹石雕檐柱。据说，这批檐柱来自福建莆田，通过水运到宁波。蟠龙檐柱中龙的形象从屋顶伴着两只蝙蝠绕柱向下飞腾，寓意福气。凤凰牡丹檐柱半嵌于墙中，上下为凤凰，中部为牡丹。这些檐柱采用整根石材雕刻而成，通过镂空等技法创造出龙凤在云层间飞腾的形象。此外，墙基、御道、柱础等处的石雕也各具特色。



木雕

木雕在庆安会馆的木制构件中使用普遍。枋、雀替、斗拱、挡板、垂柱等部位使用了大量的木雕工艺。庆安会馆的木雕均使用宁波本土的朱金木雕工艺，内容的取材为山水及人物故事。

宁波老外滩

坐落于宁波三江口北岸的宁波老外滩于1844年开埠,地处宁波市中心,位于甬江、奉化江和余姚江的三江口汇流之地,唐宋以来就是最繁华的港口之一,曾是“五口通商”中最早的对外开埠区,比上海外滩还早20年。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几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外滩之一。宁波老外滩,通过保存历史建筑和街区风貌,植入新都市文化,将厚重的历史与发展的愿望完美结合在一起。由文物、旧、渐旧、新的建筑物构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见证和载体,改造者着意打造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韵味。如今的老外滩骨子里透出现代意味,是一个集吃、住、玩、休闲、购物、娱乐为一体的时尚消费中心。



沿着江边,外国领事馆、天主教堂、银行、轮船码头一字排开,几乎记录了宁波开埠的整段历史。这些建筑,至少有100多年历史。目前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有:英国领事馆、巡捕房、侵华日军水上司令部、浙海关、天主教堂、江北耶稣圣教堂、宁波邮政局、通商银行等还有一些民房,如老“宏昌源号”、商人私宅“严氏山庄”、“朱宅”等建筑,这些建筑具有浓郁的欧陆风格,代表了英、法、德、荷等多国建筑风格。与中国传统民居形成鲜明对比。

宁波老外滩 位于宁波市三江口的江北岸，是进入宁波古城的门户。宁波在唐代即为中国四大港口之一，鉴真东渡的起始点就在宁波，在南宋时期为中国三大港口之一，并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对外贸易的。虽然清政府一直采取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但宁波与日本、南洋各地一直保持着藕断丝连的贸易往来。清初中国缺铜，政府铸铜钱和民间制铜器多通过宁波从日本进口铜及银等；而日本也从宁波进口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等。在清代实行全面闭关之时，宁波是唯一保留了对外贸易的特殊港口。这种特殊的港口地位从1644年到1684年左右，时间长达约40年。

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宁波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各国商人蜂拥至宁波，英、法等国采用夺取主权，建立据点，霸占海关、控制海口，垄断航运，推行洋化等一系列手段，把宁波港扭曲成半殖民地性质的港口。1844年正式开埠。不久，江北岸便发展成为英、法、美三国侨民居留区域。是中国最早的"租界"之一，历史上也称为"外滩"，其开埠历史比上海外滩还要早上20年，是目前中国最古老的外滩之一，一直到上海口岸崛起，宁波口岸的地位才被逐渐削弱。1927年，中国政府收回了江北岸外人居留地的行政管理权江北外滩也在岁月的洗礼中完整地记录下了近代宁波的历史变化，体现西方工业文明的器物与各类设施集中在这里出现，如宽敞的马路、整洁的街面以及电灯、自鸣钟、脚踏车、洋房、教堂、医院、银行等首先在这里出现，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宁波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现存能反映港口文化的外滩。

宁波商帮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四大商帮之一(晋、徽、宁绍、潮汕)，利用外滩这一通商口岸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对内、对外的航运贸易优势，纷纷创办轮船公司，其中以宁波帮的商人--虞洽卿、朱葆三、李云书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运输公司最为出名，在三江口到下白沙一带修建码头，从事宁波至上海等地的运输，特别是从事对外经济活动，宁波商帮便以上海、宁波为基地，经商足迹遍及长江流域和天津等商埠。《鄞县通志》称:"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

从最近一次文物普查情况来看，宁波外滩的54处文物建筑中至少有31处与宁波商帮有关，在这些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建筑物，反映了丰富多彩的西式和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从建筑功能看，既有办公和宗教活动场所，又有金融、贸易和豪华住宅。为此，外滩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宁波近代历史标志性地段，被《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为6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本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范围为:东滨甬江，南接新江桥，西界人民路，北至轮船码头。在目前开发改造范围内，巡捕房、宏昌源号、朱宅和严氏山庄四幢建筑被列为市级文保建筑。

海商与宁波帮

海商代表人物

因为对外贸易利润丰厚，便有胆识过人的甬商甘冒风险，横渡波涛汹涌的大洋，在中日之间经营航运和贸易。这在1200年前决非易事，指南针尚未发明，完全“听天由命”，任凭大洋环流和季候风带往目的港，风暴经常使航船倾覆，或者把他们吹到不知哪个遥远的地方。但是，宁波人“恬风波而轻生死”，海浪和风暴阻挡不住他们谋利的勇气，其代表人物李邻德、张友信、李延孝等人的业绩，甚至记载于正统史书。被称为“唐商团”的李邻德家族，曾在明州港与博多津之间往返百余次。张友信是中国航海史上公认的大航海家、造船家，以日本肥前松浦郡港为基地经营海运业，参与这项事业的人达37人。而李延孝商团更是多达60余人，活动于明州港和值嘉岛。还有一个张保皋商团，从事明州与新罗的贸易，不但把浙东越窑青瓷运销朝鲜半岛，而且还带去了青瓷烧制技术——明州也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东亚、东南亚以及北非各地，都曾出土过上林湖越窑青瓷。



宁波帮

“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宁波帮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贡献。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工商巨子。

形成发展

明末清初为宁波商帮初始形成阶段，其主要活动地域在北京，主要经营行业是药材业和成衣业。

宁波帮形成后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清乾嘉时期。这一时期宁波帮海商获得迅速发展。宁波帮的活动区域不仅在长江和南北洋，而且延伸到海外，经营着合法而颇有规模的对日贸易。由于这一时期宁波帮的大发展，使一个普通的中国沿海地域商帮，一跃成为国内著名商帮。

宁波帮形成后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鸦片战争后，宁波帮凭借自身特殊的有利条件，迅速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领域，并形成了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商人的为代表的宁波帮新式商人群体。什么是买办？买办就是外资洋行中的中方经理，是中西方贸易的中介人。我们说买办和进出口商人是新式商人，是因为他们从事的交换，已经不是以小农为交换两端的传统交换，而是以中国农产品和西方工业品相交换的国际贸易。这种交换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冲击着中国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形态，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

宁波帮形成后第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以新式商人为主的宁波帮商人将商业利润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形成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这一时期的宁波帮以当时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上海为基地，创造了100个左右全国第一，涌现出一批“大王”，抒写了中国工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

宁波帮形成后第四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的数十年。这一时期有一批宁波帮工商业者移资海外各地，但大部分宁波帮工商业人士以香港这个国际自由贸易港为中心继续发展，其后裔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移居海外各地的宁波籍人士一起，被称为现代海外宁波帮，他们在海外创造的业绩，举世瞩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香港、澳门的回归，海外以及港澳台积极投资内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宁波帮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宁波帮与新兴的内地宁波籍人士实际上正在融合为新型的现当代宁波帮。这个正在崛起的现当代宁波帮已经产生了若干新的组织。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不少城市成立了以宁波籍人士为主体的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特别是上海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和宁波同乡联谊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出版《海上宁波人》会刊。我们镇海中兴学校校友会上海联络处还是他们的团体会员。这些协会既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又带有鲜明的乡亲色彩，对于沟通信息，加强交流，增进了解，解决困难，促进宁波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历史贡献

经济发展

在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宁波帮占有重要地位。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不仅有力地瓦解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推动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且使以洋货为载体的西方文明较快地进入中国，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与此同时，宁波帮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特别是发展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产业，并创造出一大批国货名牌，有效地抵制外货的倾销与垄断，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竞争力。而由宁波帮经营的近代金融业以强大的实力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变革与运动

近代以来，面对多灾多难，落后挨打的祖国，在外创业历经磨难的宁波帮商人多有一份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有的进而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其中宁波帮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行动尤为人称道。

许多宁波帮商人都程度不同地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表示同情与支持，有的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更多的则在经济上支持革命党人。如从事航运业的赵家藩、赵家艺是宁波帮中的中小商人代表。1905年赵氏兄弟与革命党人张静江去法国巴黎经商，以所获利润全部用于资助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著名宁波帮企业家项松茂、方液仙面对强敌威武不屈更成为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